

权力格局、国王支持与泰国军人政权的韧性

曹 航 唐世平

内容提要: 学界对发展中国家政权韧性(持续时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但一直未重视军人政权差异化的韧性问题。通过比较 1947~1992 年间泰国的 5 次军人政权,文章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军人政权在韧性上有着显著差异。文章认为:只有建立在军事寡头之上且得到国王强力支持的军人政权,才享有高度韧性(长期持续且有高稳定性);建立在军事寡头之上但缺乏国王强力支持的军人政权,只具有中度韧性(长期持续但只有低稳定性);建立在文武多头之上的军人政权,无论是否得到国王的强力支持,都难以长期执政,故只具有低度韧性。文章有助于推动对军人政权进行专门、细致的后续研究。

关键词: 军人政权 政权韧性 军事寡头 文武多头 国王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20)01-0179-13

一、问题的缘起

自 1932 年 6 月的“立宪革命”推翻绝对君主制以来,泰国军人不仅多次通过军事政变干政,而且长期占据总理及重要的内阁职位。据统计,从 1932 年 6 月 28 日君主立宪制下首任总理组阁到 2014 年 5 月 22 日政变(共 29914 天),泰国军人直接或通过扶持文官执掌政权达 18803 天(约占 62.86%),而文官真正独立掌权的时间大概只占 37.14%^①。如果只看 1932~1992 年的情况,军人掌权的时间比重更是高达约 83.66%(18306/21881)。由此可见,相比于文官,泰国军人对政权的掌控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不过,不同时期泰国军人政权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政权的持续时长(duration)和稳定性(stability)两个方面。简言之,有时泰国的军人政权能够长期执政并维持政治稳定,而有时则只能短暂地维持统治,或者尽管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统治却没能实现政治稳定。那么,为什么不同的军人政权在持续时长与稳定性方面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呢?本文将通过对泰国的纵向历史比较来解释上述差异,并借此理解军人政权运行背后的政治逻辑。

展开论述之前,须明确两个关键概念。其一,军人政权是相对于文官政权(civilian regime)而言的,意味着该政权最初是经由军事强制手段(如公开的政变行动、隐蔽的武力胁迫等)、绕过既定的法律程序建立起依靠军人统治的政治秩序(Nordlinger, 1977; 陈明明, 2003)。在现实中,军人政权可能会邀请退役军官或扶持傀儡文官在台前代为执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后军人手中。其二,本文以政权韧性(regime resilience)指代某个军人政权的持续时长和稳定性高低(Slater & Fenner, 2011; Levitsky & Way, 2012)。持续时间长且稳定的军人政权拥有高度韧性,持续时间长但不稳定的军人政权则具有中度韧性,持续时间短暂的军人政权都只看作具有低度韧性。对于持续时长,本文按“执政天数”计算,即军人政权从上台到下台所经历的总天数。一个军人政权始于军人通过强制手段推翻先前的政府(从政变次日计算),止于该政权被公开政变直接推翻,或在隐蔽的武力胁迫下向军人竞争对手让出权力,或因各

作者简介: 曹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感谢黄振乾、叶成城、王凯等人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数据源自“泰国内阁秘书处网站”: http://www.soc.go.th/eng/bb_main21.htm。

种内外压力被迫还政于民。结合泰国的国情,本文将连续执政时间超过两届八年(约2920天)的军人政权归为“长期持续”,否则为“短期持续”。对于稳定性,本文用“政变次数”来衡量其高低。某个军人政权执政期间发生的政变次数越多,表明权力精英更依赖强制力来解决分歧,亦即政权的稳定性越低,反之则越高。

文章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既有相关研究,并概述泰国军人政权的基本情况;第三节阐述解释框架和由此生成的推论,说明案例选择与案例分析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四节为案例分析,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泰国军人政权,验证相关推论,同时回应可能的竞争性解释;最后是简短的结语。

二、文献回顾与泰国军人政权概述

本节首先回顾三类既有文献,包括泰国军人干政研究、一般的军人政治研究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权稳定性的研究。之后,对泰国军人政权进行简要概述,以交代历史背景,并为建构解释框架做铺垫。

(一) 文献回顾

无论就出现的频次,还是就持续性与稳定性上的差异来说,泰国军人政权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这为比较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遗憾的是,泰国这一典型案例似乎长期被比较研究者所忽视。专门研究泰国政治的学者通常只重视考察泰国军人的干政行为及其后果(Wilson,1962;Kamol,1969;Surachart,1999),很少关心军人政权本身的运行。近年来,泰国军人干政的频率和程度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关研究更加关心军人与泰国政治发展前景的关系。由于总体缺乏比较视野,泰国政治研究者几乎从未针对某个问题提供严谨的因果解释,也未重点关注军人政权的韧性。即便如此,这些文献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图景,奠定了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凭借广阔的比较视野和宏大的理论追求,西方学界关于军人政治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成果。频发的军事政变使学者们对军人干政的动机、条件及后果等议题尤为关注,相关著述几乎涵盖了军人从“政变夺权”到“还政于民”的整个生命历程(Nordlinger,1977;Perlmutter,1977;Danopoulos,1988)。然而,对军人政权的韧性及其差别的讨论明显存在欠缺,学者们长期抱守“军人政权天生短命”^①的信念,直到最近才开始强调军人政权的持续性问题(Agüero & Brückner,2018)。事实上,军人在西班牙、埃及、利比亚、苏丹和缅甸等国曾经维持了长期统治地位,而文官政权在泰国虽然时有出现,但其执政时间较之军人政权要短暂。这些军人长期执政的典型案例理应得到格外的重视,研究者不能因“统计不显著”而无视军人政权在持续性方面实际呈现出的多样性。此外,目前从脆弱性和稳定性两个角度探讨军人政权的文献也很少见,研究者通常止步于描述性的类型划分,而没有提供因果解释。

对发展中国家政权稳定性的研究早已成为比较政治学的热点话题,尽管相关文献很少对军人政权给予特别的重视,但其中不乏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洞见。学者们提炼出确保政权稳定的“三大支柱”——合法化、镇压与吸纳,重点考察了执政党(联盟)建设、外部压力、历史遗产与精英网络等因素的作用^②。表面上看来,这些文献在提问方式、解释变量、研究方法、案例选择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但基本都是从“合法性”与“执政能力”两个维度去探讨政权的韧性。因此,当前有关政权持续性或稳定性的文献已经产生了相对定型的研究范式,这为本文的解释框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既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的研究策略并非时兴的跨国比较和统计分析,而是针对单一国家的纵向历史比较。

(二) 泰国军人政权概述

为便于论述,本文把泰国发生的政变分为四类:(1)反对者有政变计划但未真正实施的“流产政

^① 就统计显著性而言,军人政权在世界范围里与其他类型的政权相比,确实是不稳定且难以长期维系的,这一状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仍然如此(Nordlinger,1977:138~139;Geddes, et al.,2014)。

^② 此类研究参见Brownlee,2007;Levitsky & Way,2010;Slater,2010;Gerschewski,2013;Choucair - Vizoso,2016。

变”,其原因可能是被预先挫败或谋划者主动放弃,但这通常会引发后续的政治清洗;(2)反对者采取行动后因遭到镇压而失败的“未遂政变”,镇压之后一般也会伴随政治清洗;(3)掌权军人发动的旨在巩固或扩大既有权力的“自我政变”;(4)作为政权更迭标志的“成功政变”,即反对者公开或隐蔽地实施了政变行动并推翻了先前的政权。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简述 1932~2008 年间泰国先后出现的 7 次军人政权,主要涉及政权建立者、持续时长和执政期间发生政变的次数等内容。

第一次军人政权由披耶·帕凤裕廷(Phraya Phahonyothin)在 1933 年 6 月 20 日发动政变后建立。1938 年 12 月帕凤主动隐退,其亲信将领披汶·颂堪(Phibun Songkhram)接任总理。1944 年 7 月,在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和迁都议案多次遭到议会否决后,战时与日本合作的披汶被迫辞职。“帕凤—披汶政权”期间发生了 3 次未遂政变。第二次由“1947 年政变团”联合披汶在 1947 年 11 月 8 日发动政变后建立。“披汶政权”在 1957 年 9 月 16 日因政变而倒台,期间发生了各种政变至少 9 次。第三次由时任陆军司令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发动政变后建立。1963 年 12 月沙立病逝后,其亲信他依·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接任总理,直到 1973 年 10 月 14 日因民众抗议而被迫还政于民,期间发生了 2 次自我政变和 1 次未遂政变。第四次由海军上将沙鄂·差罗如(Sangad Chaloryu)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发动政变后建立。沙鄂先后支持了两位总理上台,其中江萨·差玛南(Kriangsak Chamanan)任职时间最长,故称为“沙鄂—江萨政权”。1980 年 2 月 29 日,因受到军内反对派的威胁,江萨选择辞职而交出权力。该政权经历了未遂政变、自我政变和成功政变各 1 次。第五次为取代沙鄂—江萨政权的“炳政权”,其建立者为时任陆军司令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炳于 1988 年 7 月大选后主动隐退,掌权期间经历了 2 次未遂政变。第六次为顺通·空颂蓬(Sunthorn Kongsompong)与素金达·甲巴允(Suchinda Kraprayoon)在 1991 年 2 月 23 日政变后建立,到 1992 年 5 月 24 日素金达因民众抗议而辞任总理为止,期间未发生政变。第七次由时任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Sonthi Boonyaratkalin)在 2006 年 9 月 19 日推翻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民选政府后建立。颂提先是牵头组建过渡的军人执政机构,后又支持退役陆军上将素拉育·朱拉暖(Surayud Chulanont)出任总理,直到 2008 年 1 月 29 日大选后还政于民,期间未发生政变。综上,我们将泰国历次军人政权的基本情况总结如下(表 1)。

表 1: 泰国历次军人政权(1932~2008 年)

序号	简称	持续时长	政变次数
1	帕凤—披汶政权	4059 天	3
2	披汶政权	3560 天	9
3	沙立—他依政权	5872 天	3
4	沙鄂—江萨政权	1241 天	3
5	炳政权	3078 天	2
6	顺通—素金达政权	456 天	0
7	颂提—素拉育政权	497 天	0

三、泰国军人政权的韧性: 一个解释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和历史概述,本节从权力格局和国王对军人政权的支持程度这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以解释泰国军人政权在持续时长和稳定性上的差别。

(一) 权力格局与军人政权的持续时长

权力格局指权力资源在文武精英之间的分布情况,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类。其一为军事寡头(military oligarchy),指军人集团内的派系渐趋集中,使得只有少数军人领袖(派系)占据明显的支配地位,而文官精英总体处于附属地位。其二为文武多头(civil-military polyarchy),此时军人集团内的派系渐趋分化,

以致派系林立而没有哪个军人领袖(派系)占据明显支配地位,文官精英甚至可能扮演势均力敌的角色^①。上述分类涉及两个维度:一是支配性,即是否存在特定军人领袖(派系)具有较高的议价能力,进而主导文武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二是异质性,即军人集团中的各级军官是否有较大的军事、社会和意识形态等背景差异。在现实中,“支配性”与“异质性”几乎总是共变的,因为它们往往受制于共同的原因,如军人集团的利益遭受文官政府的损害、军人职业主义精神盛行而忌讳干政等。换言之,如果把两者置于一个 2×2 矩阵当中,我们只会看到两种组合的出现,即“有支配性+低异质性”和“无支配性+高异质性”。这其实很好理解:支配性局面的产生几乎必然意味着异质性程度的降低,因为一旦个别派系占据主导,利益和目标的协调将会变得相对容易,其他弱小的派系或暂时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军官,要么被吸收到主流派系中,要么彻底被边缘化而不具政治影响力。与此相对,社会背景、技术分工与干政观念的千差万别会使得派系过于分化,这样的军人集团在协调集体行动时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它们在掌权之前未能形成主导优势,在夺得权力之后更会陷入无尽的纷争,从而很难取得支配地位。

权力格局的上述差别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了军人政权的持续时长。其一,权力格局深刻地塑造着军队内部冲突的态势,即各个派系是走向碎片化还是渐趋集中。相比于一党制政权和个人独裁,军人政权面临的内部威胁更高,如何防范潜在的军事政变成为其首要关切。由于只存在少数占支配地位的派系,情报工作和资源调动具有了较高的便利性,寡头军人政权不仅能够强力镇压军人以下犯上的政变行动,而且拥有预先挫败政变图谋、清洗潜在对手的政治空间。相比之下,多头军人政权在面对内部的派系冲突时,很难采取有效的强制措施,即使在挫败一次政变后,这样的政权也不具备彻底清洗政治对手的能力。更糟糕的是,许多时候多头军人政权在政变实施之前就已经撑不住了。其二,权力格局几乎决定了军人政权能否有效压制文官反对派的挑战。寡头军人政权不仅拥有打压、排斥文官反对派的能力,且通常具备胁迫官僚集团进行合作的手腕和空间。反观之下,多头军人政权则难以压制文官反对派,因为既无法调动足够的资源,又不能有效协调集体行动。更多的时候,多头军人政权可能得仰仗文官集团的配合才能维系,如通过政治吸纳来安抚文人的不满情绪,而这通常就意味着权力资源的流失。其三,权力格局对军人政权的施政效率也有重要影响。对于寡头军人政权来说,实现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合作,可供选择的手段有多种,例如指派亲信军官担任部门首长、挑选派系色彩较淡的技术官僚委以重任以及争取更大的直接任命议员的权限等,甚至在必要时强行解散议会代之以军事管制。寡头军人政权在决定大政方针时享有较高的自主性,可以推出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也能制定和实施较为连贯的外交政策。相较之下,多头军人政权一遇重大政策问题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很难顺利施政,这不但会招致上层精英的不满,还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抗议。

当一个军人政权能够有效控制军人、压服文官并强化施政时,我们就能看到该政权的长期维系,这样的政权基本不可能是文武多头的,而只能是军事寡头。显然,一个军人政权能够长期执政,并不意味着一定能确保政权稳定,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究为何有的军人政权很难摆脱政治不稳定的困扰。

(二) 国王支持与军人政权的稳定性

自1932年确立君主立宪体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泰国国王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几乎一直呈衰落趋势。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 1946年6月~2016年10月在位)在继位后开始重塑国王权威,逐步恢复了君主的传统神圣性,获得了超凡的个人魅力。对于军人干政,国王不能公然发出邀请,也很少公开表示反对,但国王对现实政治持有特定的偏好,对不同军人政权的支持也就存在程度变化。要考察国王支持的强弱对军人政权稳定性的影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何种条件下国王会提供较强的支持,何时又削弱或撤回支持。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必须设法避免仅根据某一军人政

^① 与罗伯特·达尔(2003)不同,本文使用polyarchy一词时并不涉及对政体性质或类型的判断,而只是强调军人集团内部没有出现任何明显占据优势的派别,因而形成了多个军事将领(如由十数个到数十个不等的军军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与文人政党共同掌权的局面,即“文武多头”。

权的最终命运来做事后判断,而要意识到国王的某些支持行为可能是源于军人胁迫。鉴于此,本文在衡量国王对某个军人政权支持程度的变化时,主要参照以下指标(表2)。当然,我们在具体判断时并非一一参考,而是依据具体的历史情境选取指标。

表 2: 衡量国王对军人政权的支持程度

指标细项	强弱判定	
	紧张—强	和睦—弱
先前政权与王室的关系	紧张—强	和睦—弱
军人领袖与国王的个人关系	亲近—强	疏远—弱
军人政权治理理念的偏向	忠君—强	爱国—弱

对于军人政权的长期维持来说,国王的支持或许不是必要条件,但肯定会显著影响军人政权的稳定性。首先,国王是军人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国王的支持可以减轻军人政权承受的政治压力,让军人统治变得更易于被普通民众认可。倘若无法获得国王的支持,军人政权就必须寻求其他的合法性来源,但新的合法化途径一般很难与王权的庇护相媲美。其次,国王的態度不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变的成败,还能影响政变的频率,而军队内部潜在的反对者正是军人政权的要害所在。尽管国王事实上无力阻止某些政变的发生,但能在事后通过召见政变军人或发布王室公告等形式表明立场倾向,这往往会影响军人后续统治的方式,甚至可能直接将某次政变定性为叛乱。另外,军人政权在获得国王的强力支持后,反对者碍于国王的神圣权威和预期政变难以成功,通常不会轻易发动政变。相比之下,未能赢得国王支持的军人政权,其内部的派系斗争很容易暴力化,难以摆脱反对者频繁发起政变的困局。最后但也很关键的是,通过扮演军人政权与社会精英之间的“中间人”,国王可以有效引导权力资源的流向。凭借君主光环和个人威望,国王强化对某个军人政权的支持通常能吸引各类社会精英(如商业精英、佛教僧侣与世俗知识分子等)向该政权输送物质性资源和象征性资源,从而帮助增强其统治基础;反之,若没有国王的支持,军人政权就难以汲取到足够的权力资源,甚至会陷入资源日渐流失的困境。

在成功赢得民众认可、减少使用暴力且不断向社会汲取权力资源的基础上,一个军人政权就相对容易实现保持政局稳定的目标。不过,稳定性只有建立在长期执政的基础上才会有政治意义,短期的稳定局面并不意味着政权韧性高。因此,一个获得国王支持的多头军人政权经历的政变次数可能很少,但由于其持续时间太短,这样的政权仍然只具有低度韧性。

(三) 小结与案例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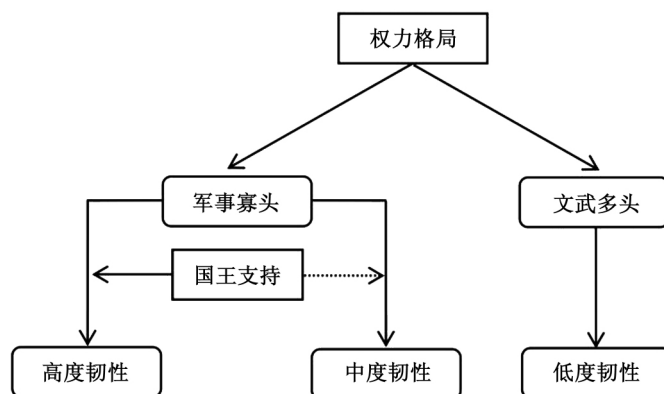
上文将“权力格局”和“国王支持”两个因素分开讨论,纯粹是为了理论建构之便,绝不意味着两者是彼此孤立的。事实上,两者既存在优先性上的区别,也有相互作用的联系。在此,我们强调以下四点:(1) 相比于国王支持,权力格局对于军人政权的维系始终是更加优先或重要的因素;(2) 权力格局最初并不源于国王的立场,但其质量会受制于国王的支持情况;(3) 国王的支持程度不由权力格局而定,权力格局也不必然影响军人政权谋求国王支持的努力;(4) 无论处于何种权力格局之下,也不管国王提供支持与否,军人政权都无法消灭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文官反对势力的潜在挑战。综上,本文的解释框架可概括如下(见图1)。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推论:

推论1:寡头军人政权在缺乏国王的有力支持时一般只能拥有中度韧性,即能长期持续但很不稳定。

推论2:寡头军人政权在获得国王的强力支持后更容易享有高度韧性,即能长期持续且保持稳定。

推论3:多头军人政权通常只具有低度韧性,即只能短期持续,此时国王的支持对政权韧性的作用不显著。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的案例分析将聚焦于1947~1992年间泰国出现的军人政权,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1) 本文致力于提供因果解释而非历史描述,目前主要依靠二手文献,而涉及上述时段的泰国历史、政治与经济等描述性研究相对更丰富,这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素材;(2) 上述时段大致覆盖了整个



注 “国王支持”左侧实线表示支持偏强,右侧虚线表示支持偏弱

图1: 权力格局、国王支持与军人政权的韧性

冷战期间的泰国政治发展,具有相似的国际环境且处于同一国王的治下,这些构成了本文解释框架的“范围条件”^①。据此,我们选出的案例包括披汶政权(案例一)、沙立—他依政权(案例二)、沙鄂—江萨政权(案例三)、炳政权(案例四)和顺通—素金达政权(案例五)。考虑到篇幅所限和方便论述,我们把五个案例分成了两组:一组是用于理论检验的案例一、二、三,它们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上呈现出显著的变化情况,能够直接有力地验证相关推论,是本文予以重点分析的主要案例;另一组是用于理论扩展的案例四、五,它们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上的变化情况符合理论预期,但典型性稍显不够,故作为本文的辅助案例。

四、案例分析之理论检验

本节通过对披汶政权、沙立—他依政权和沙鄂—江萨政权三个主要案例的比较分析,验证上文提出的三个推论。

(一) 披汶政权(1947~1957)

1947年11月前后的政治形势促成了军事寡头格局的出现。在此前三年多时间里(1944年8月~1947年11月),以比里·帕依荣(Pridi Banomyong)为首的文官自由派曾一度主政,大有实现军政分离、文官领军的势头。以陆军中将屏·春哈旺(Phin Choonhavan)为首的退役军官,遂鼓动时为陆军第一军区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沙立等现役作战军官,组成一个政变军人集团(通称“政变团”),发动政变推翻了受比里支持的民选政府。由于缺少从政经验和社会声望,加上担心美、英两国很可能反对军人上台,政变团在公布临时宪法之后,旋即邀请披汶再度担任陆军司令,并扶持文官保守派领袖宽·阿派旺(Khuang Aphaiwong)出面组阁。在宽内阁短暂履职期间,军方各派迅速聚集了远超文官各派的权力资源,形成了军事寡头格局。在支配性方面,屏中将及其女婿炮·西耶暖(Phao Sriyanond)组成的屏—炮派、指挥驻曼谷部队的沙立派和作为政治纽带的披汶成为少数掌握实权的派系,文官各派要么甘心从属于军人,要么谋求恢复权势。与此同时,政变团内部的异质性较低,其成员以陆军军官为主体,在使用武力抵御文官威胁、捍卫军人利益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政变后不到半年,宽内阁受胁迫而辞职,披汶政权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为巩固主导地位,披汶政权先后三次采取行动肃清军人集团内部的反对势力。1948年10月,以内德·肯玛裕廷少将(Net Khemayothin)为首的多名陆军参谋部军官计划发动政变,希望以军人职业精神对抗军人干政。因计划泄露,炮(Phao)率领警察部队预先逮捕了数十名军人,并趁机对陆军系统中的不

^① 从方法论层面对“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进行的讨论,参见 Mahoney & Goertz, 2004; 叶成城等, 2018。

服从者进行清除。1950年1月,因未能如愿担任国防部长,原政变团的重要成员陆军上将奎甲德(Luang Kat Katsongkhram)遂积极培育自己的派系力量,其举动刺激了屏一炮派势力。炮先发制人逮捕了奎甲德,并强行让其搭乘事先备好的飞机前往香港流亡,后又指控其犯有叛国罪(Suwannathat - Pian, 1995:196~197)。1951年3月,在香港流亡约一年后,奎甲德回到泰国,试图策动海军上将他汉(Thaharn Kamhiram)等人发动政变,结果计划败露导致许多涉事人员被捕,他汉本人也被迫躲藏起来(Blanchard, 1958:125; Suwannathat - Pian, 1995:165)。此后直至披汶政权倒台,陆军中的反对势力遭到全面控制,再无产生新的支配性派系的可能。

与控制军人同时进行的是压制文官反对派的挑战,这包括镇压比里派策动海军军官发起的两次未遂政变,以及对文官保守派的多次武力胁迫。1949年2月26日,文官自由派领袖比里秘密回到泰国,策动部分海军军官发动政变以求夺回政权,但因遭到沙立的强力镇压而失败(Fineman, 1997:82~83; 周方治, 2011:105)。这是比里放弃其一直坚持的宪政主义立场,采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首次尝试,史称“王宫叛乱”(Palace Rebellion)。此役之后,比里仍旧没有放弃夺权,海军也因未受到严重惩罚而保有相当的实力,他们决心伺机而动。1951年6月29日,在出席美国捐赠的“曼哈顿号”打捞舰交接仪式时,披汶遭海军政变者公然劫持并被押送至海军旗舰“阿瑜陀耶号”上。发起政变的海军军官希望以此来挟政变团,为下一步的夺权行动争取时间。然而,屏一炮派和沙立派完全无视披汶的性命安危,于7月1日炸沉“阿瑜陀耶号”,披汶本人幸免于难后独自游到岸边(Wyatt, 2003:259~260; Baker & Pasuk, 2009:142~143)。“曼哈顿叛乱”(Manhattan Rebellion)之后,政变团坚决要求对海军系统进行彻底清洗,披汶则想再次宽大处理以期争取海军的支持,达到制衡其他两派的企图,但遭到否决。于是,大批海军军官被解职,代之以政变团的亲信;海军的陆上力量被彻底剥夺,或为沙立派陆军集团接管,或为屏一炮派的警察部队掌控(Thak, 2007:41~42; 周方治, 2011:106)。

相比之下,文官保守派虽然免于流血牺牲,但也受到了政变团的持续打压。为了实现对政权的直接掌控,政变团在1948年2月和4月两次以武力胁迫他们扶持的文官总理辞职,并最终达成目标(Darling, 1965:64~65; Fineman, 1997:52~54)。然而,文官保守派在议会中依然占有多数席位,并试图通过增强国王的权威来阻止政变团的权力扩张。对此,政变团决心以自我政变的方式彻底消除议会和宪法的掣肘。1951年11月29日,不顾披汶本人的反对,政变团发动所谓的“电台政变”(Radio Coup),以电台声明的形式宣布解散议会,取缔政党,禁止集会,废除1949年宪法(Thak, 2007:51~52)。1952年3月8日,政变团公布了修正的1932年宪法,恢复一院制议会(其中半数由选举产生,半数由总理任命),并允许现役军官进入内阁(周方治, 2011:108)。至此,政变团实现了对军队、政府、议会等权力机构的全面掌控,不再有任何反对势力能构成有效威胁。当内阁职位大多由政变团成员占据,议会沦为橡皮图章,披汶政权施政的阻力就大大减小了。政府提出的所有议案都能在议会中以压倒性多数获得批准,而且效率极高,有时只需几个小时就能三读通过近十项议案(Darling, 1965:120~122)。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披汶政权期间,各派精英频繁诉诸强制手段,这足以表明其政权稳定性偏低。即使在电台政变之后,精英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只不过由于转化为政变团的内斗,冲突得以隐蔽化。例如,1952年6月,沙立试图发动政变以实现个人全面掌权,只是碍于时机不成熟和披汶的平衡作用而作罢;1955年6月披汶外访期间,炮试图以其掌控的警察部队来遏制陆军司令沙立的权势增长,却遭到披汶和沙立的联手压制,之后屏一炮派在内阁和陆军系统中的重要职位被一一剥夺(Suwannathat - Pian, 1995:63, 94, 165, 208~210)。随着沙立派实力的不断增长,披汶政权内部脆弱的平衡局面终究没能维系下去。1957年沙立发动政变后,披汶与炮被迫流亡海外,直到去世也没能再回国。

为什么披汶政权没能保持政治稳定呢? 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披汶政权始终没有获得国王的有力支持。一方面,政变团与王室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他们不仅持续压制具有保皇倾向的文官保守派,还暗中与王室较劲以防国王权威复兴。屏一炮派认为强化国王权威会损害自身的派系利益,非常忌惮他人

利用与王室的关系组织起新的派系力量。文官保守派努力用保皇宪法来束缚政变团的权力扩张,结果也招致政变团的强力反扑。就在预计普密蓬国王从瑞士返回曼谷的前两天,政变团发动“电台政变”废止了1949年宪法,这一时机选择正是要给国王造成一个既定事实,以便在制度上阻断王权的复兴(Nuechterlein,1965:63~64;Thak,2007:53~54)。政变四天后,普密蓬国王拒绝承认既成的政治形势,并表达了心中的不悦;经政变团与摄政王的多次谈判,国王在搁置多日之后还是不得不同意实施新宪法(Darling,1965:91~92;Baker & Pasuk,2009:143)。可见,政变团对国王的防范明显多于利用,还不时地给年轻的国王制造政治麻烦。另一方面,披汶个人的政治理念、与王室的历史冲突阻碍了其与国王建立亲近关系。披汶坚持1932年永久宪法所确立的精英民主体制,主张反对君主享有无限权威,但也辩称自己不是反对君主制。再度担任总理后,披汶不仅禁止普密蓬国王离开首都去考察地方民情,还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佛教的庇护者,在筹备佛历2500周年庆典时有意淡化国王的传统角色,以致国王最终拒绝出席(Thak,2007:66~67;Baker & Pasuk,2009:147)。作为1932年“立宪革命”的重要推手,披汶与王室的历史关系也很糟糕。1933年10月,披汶因领导镇压亲王叛乱而崛起,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个人独裁,不但监禁许多王室成员,还以“民族领袖”自居大搞“收复失地”运动,从而僭夺了王室的政治话语权。

总之,披汶政权能够维持近十年的长期执政地位,主要得益于军事寡头对权力的垄断。在此期间,各派精英都习惯使用强制力来解决分歧,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政变与清洗、叛乱与镇压的事件。暴力化的精英冲突使得披汶政权无法实现政治稳定,直到被政变推翻。倘若披汶政权赢得了国王的有力支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精英冲突的暴力水平会显著下降,这不但会直接增强政权稳定性,还可能延长政权持续时间。

(二) 沙立—他依政权(1957~1973)

1957年2月大选后,披汶涉嫌贿选的消息引发学生的强烈抗议。负责平息事态的沙立趁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公正”立场——理解和支持反政府示威活动。同年8月,沙立与披汶政权分道扬镳,带领一众追随者辞去内阁职务。这一行动导致数十名任命的议员退出了支持政府的行列,沙立由此赢得了道义和政治的双重优势。9月16日政变夺权后,沙立身居幕后扶持了两任过渡性总理,一位是律师兼外交官乃朴·沙拉信(Pote Sarasin),另一位是其军中亲信他依。1958年10月20日沙立再次发动政变,废除1952年宪法,解散议会,取缔政党,并禁止五人及以上的集会。1959年1月28日临时宪法颁布后,沙立正式出任总理,从而开启了一个极具变革性且影响深远的“沙立体制”时代。

在沙立体制下,军人政权的领袖实现了对全部武装力量的掌控,并通过“政治反哺军队”的手法确保了军队的团结及其对政权的支持。沙立一人身兼陆军司令、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警察总长等职位,这就使屏一炮派之前倚重的警察部队不再可能与陆军相抗衡。沙立特别重视对陆军系统的掌控,他在出任总理后也不曾放弃兼任陆军司令,并通过亲信牢牢掌握着第一师的指挥权。沙立去世后,其继承者他依和巴博·乍鲁沙天(Prphas Charusathien)基于姻亲关系延续了对陆军指挥权的掌控,直到1973年10月事件的前夕。为巩固军人对政权的支持,沙立努力构建一种新的军人形象,即军人不仅能够胜任政府职责从而成为“政治家”,还能避免沦为“政客”;军人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军事专业领域,而应该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学习处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技能(Thak,2007:195~202)。军人通过转变角色,得以无所顾虑地像普通文官一样参与政治,并从中提升了自身的政治技能和社会声望。这种以政治反哺军队的操作,使得领导人与军队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层级制度,有效抑制了军人内部的派系分化态势,在较长时间内防止了反对者发动政变。

对于文官集团,沙立、他依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既着力驯服文人官僚精英,又谋求增进文武精英之间的理解与融合。对于沙立来说,由总理直接掌握决策权是解决官僚机构之间相互指责与竞争的必要之举。为此,他改组了总理办公厅的权威结构,将总理的地位从原来“平等磋商的首席部长”提升为“垂直指挥的最高领导”,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权、对公务员的监督权、对教育机构尤其大学的监管权及

发展项目资金的分配权等,都划归总理直属(Thak,2007:183~187;周方治,2011:131~132)。当然,官僚精英并没有被彻底排斥在外,他们作为军人政权的忠诚仆从,在“专家治国”的号召之下主要承担政策执行和技术支持的职能。在沙立—他依政权持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人领袖通过任命制宪会议成员和国会议员牢固掌控立法权。更关键的是,临时宪法第17条授权总理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刻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消除对国家安全、王权存续及法律秩序的潜在威胁。这一规定使得军人政权拥有了近乎凌驾一切的任意决断权,任何反对势力及其行动都很容易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在大权独揽之余,沙立也不忘对文官精英进行思想改造,以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支持热情。大量文官被要求参加国防学院的教育培训,他们在了解军人何以能治国理政的同时,又与各类军官建立起私人联系。经由这样恩威并施的过程,沙立—他依政权得以在政治心理和个人情感两个层面说服文官接受军人统治。

为配合“革命”的推行,沙立—他依时期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力求把军人领袖塑造成爱民如子的“慈父”形象。担任总理后不久,沙立就组织专家学者着手制定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于1961年推出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1963年又组建专门的国家发展部并亲自兼任部长。发展计划的内容与世界银行的建议相差无几,但真正受到军人政权重视的主要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而投入最多也正是水源、道路和供电等日常生活领域(Muscat,1994)。不可否认,发展规划的实施的确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尤其使泰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延伸至偏远落后的乡村地区。然而,沙立体制下的现代化扩散既没有开发泰国地方社会的潜能,也没能突破原有社会结构的限制,最终只是“没有发展的现代化”(Jacobs,1971)。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沙立—他依政权摆脱了披汶时代“三足鼎立”的争斗局面,在近乎单极主导的军事寡头格局的基础上维持了长期统治。与此同时,沙立—他依政权还凭借浓厚的保守色彩获得了国王的有力支持,使军人集团与国王达成前所未有的政治默契,这是披汶政权无法企及的优势。在这种默契下,军人集团有意识地复兴国王的神圣权威,相关举措包括:要求国民觐见国王时必须行跪拜礼,定期举行军队效忠国王的仪式,将国庆日从6月24日(推翻绝对君主制的纪念日)改为12月5日(普密蓬国王的生日),在立法上强化对“冒犯君主罪”的刑事处罚(Thak,2007:206~214)。国王也不再隐居王宫,而是在军人政权的鼓励下积极出席庆典、接触民众和出国访问,这既为国王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也减少了国内外公众对军人统治的批评^①。显然,沙立—他依政权基本抛弃了先前披汶政权的防范心理,力求通过与国王合作关系来充分汲取国王所能赋予的合法性资源。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国王的有力支持加上军人政权以政治反哺军队的操作,使得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派系分歧变成了次优选择。所以,与披汶时期政变频发形成鲜明对比,沙立—他依时期泰国仅发生三次政变,且只有一次反对者未遂政变引发的政治清洗,另外两次均为自我政变。与此同时,国王的支持还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向政府公共项目,从而帮助增强军人政权的稳定性。在泰国,各类社会精英历来愿意以进献国王的方式提供金钱捐助,从而获取地位象征和积累功德福报。沙立执政后,大量社会捐赠经由国王流入军人政权手中,且多以慈善和社会福利的名义;军人政权积极利用国王的支持来劝说人们慷慨解囊,如以共产主义威胁君主制为由号召商人解囊(Thak,2007:214~218)。如此,沙立—他依政权便通过国王从社会精英群体当中获得了切实的金钱回报,而王室的财富也得到了明显增加。

沙立—他依政权从政变夺权之日起就确立了军事寡头格局,并且陆军系统对各项权力的垄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重要的是,该政权与国王之间的密切关系堪称绝无仅有,几乎贯穿政权持续的整个时期。正是因为如此,沙立—他依政权才展现出了高度韧性。

(三) 沙鄂—江萨政权(1976~1980)

1973年10月14日,他依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流亡国外,沙立—他依政权的倒台造成了暂时性的权力真空。从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泰国经历了短暂的由文官主政的“民主实验”时期,

^① 关于1954~1971年间普密蓬国王出席公开活动的类型及频次变化,详见Thak,2007:219。

期间举行了两次大选,先后有三位文官总理上台组阁四次。军人权势的相对衰落和内部派系林立的情势,造成了沙鄂—江萨政权上台前后的文武多头格局。一方面,从城市到农村、从革命到反动、从左翼到右翼,从温和到激进,军方之外的各种社会势力都在谋求引领国家的发展道路,泰国政治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极化(Morell & Chai - Anan, 1981)。另一方面,泰国军人集团内部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陆军丧失了先前的绝对主导地位,涌现出多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派系,但却没有任何一派拥有支配性的实力优势。

根据离权力中心的远近,本文把沙鄂—江萨政权上台前后的军人派系分成三组^①。第一组是处于权力中心近周的派系,往往围绕某个高级将领结成了比较广泛的庇护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吉德·西瓦拉(Krit Sivara)、巴博、江萨等人的追随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偏保守但相对温和。第二组为越南战争期间泰国外派部队的指挥官,如驻南越部队的差拉·希伦西里(Chalat Hiransiri)陆军上将和驻老挝部队的威敦·亚沙瓦(Vitoon Yasawat)陆军上将,他们是军人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对政治现状抱有激进的态度。第三组是正在由外向中心发起进攻的中层军官,包括“民主战士团”(Democratic Soldiers)和“青年军官团”(Young Military Officers Group)两派,前者的成员最初以负责对泰国共产党进行宣传与招抚的参谋军官为主,其公认领袖为差瓦立·永猜裕(Chavalit Yongchaiyudh);后者亦称“泰国青年土耳其党”(The Thai Young Turks),其成员几乎全部为皇家军事学院第7班(1960届)毕业生。

1976年10月6日晚间,刚刚卸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沙鄂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废除1974年宪法。随后,沙鄂领导组建军人临时掌权机构——“全国行政改革委员会”(Nation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Council, NARC)。10月22日临时宪法公布后,由国王举荐的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宁·盖威迁(Thanin Kraivichien)出面组阁,NARC的成员遂又组成总理顾问委员会(Prime Minister's Advisory Council, PMAC),此时沙鄂入阁再任国防部长,甲莫尔转任PMAC主席,江萨仍为秘书长。尽管NARC/PMAC的成员大多曾为吉德的追随者,但由于内部高度的异质性和陆军系统的分裂,他们仍然无力主导政局。事实上,身为海军上将的沙鄂牵头发动政变,这本身就表明陆军军官不再是支配性力量;但沙鄂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让海军抢先一步,而非绝对的实力优势^②。不仅如此,NARC还面临其他军人派系的政变威胁。1977年3月,极右翼军人代表察拉上将领导数百名军官及部分文官,企图武力推翻他宁内阁,但遭到镇压;同年6月,“青年军官团”的部分成员也试图发动政变,只是在寻求陆军高级将领支持未果后主动放弃了计划(Chai - Anan, 1982:34; Chambers, 2013:196~197)。

他宁的极右翼“反共”政策让泰国民众意识到文官独裁并不比军人统治宽松,这给军人重回政治前台制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1977年10月20日,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江萨发动政变,推翻他宁内阁,恢复设立NARC(Chambers, 2013:199)。11月9日临时宪法公布后,江萨被推举为总理。然而,江萨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他不曾担任拥有实权的陆军司令一职,只是在国防部和总司令部主持三军协调的工作。为确保长期执政,江萨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在陆军系统中寻找新的支持力量,任命数十名青年中层军官为上议院议员(约占三分之一),扶持炳出任陆军司令(后又兼任国防部长);二是颁布了一部折中妥协的新宪法(1978年12月22日),允许政党竞争。不过,上述安排并未达到预期效果。1979年4月大选后,由于没能将较大的政党纳入执政联盟,江萨第二次组阁后的施政陷入困境,军方议员决定撤回支持(Girling, 1981:223~226)。1980年2月底,隶属“青年军官团”的议员以未能有效回应民众需求为由,要求江萨内阁下台,并暗中联络炳让其在必要时支持发动政变,江萨在压力之下最后选择辞去总理职务(Chai - Anan, 1982:36~37; Chambers, 2013:204~205)。

上文的论述表明,沙鄂—江萨政权的低度韧性主要源于文武多头格局,那么在此期间国王的支持情

^① 主要参考自Girling, 1981:228~230; Chai - Ana & Suchit, 1985:90~109; Pasuk & Baker, 2002:344~349; Chambers, 2013:180~192。

^② 1976年10月6日政变前夕,至少还有其他两派也在策划武力夺权,包括巴博的追随者、军人极右翼派,但陆军内部的严重分裂迟滞了他们的行动,结果让海军将领捷足先登(Chambers, 2013:192~193)。

况如何呢?本文认为国王对沙鄂—江萨政权的支持总体上偏弱,虽然可能好过披汶政权。与披汶政权相比,沙鄂、江萨等军人领袖在与王室打交道时并无历史包袱,也未显示出对王室不敬或与国王争夺权威的迹象。此外,20世纪70年代后期泰国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也有利于军队与国王的合作。然而,沙鄂—江萨政权并没有赢得国王的有力支持,主要原因在于普密蓬国王此时已经享有独立的政治权威,在与军人集团互动时更加自主和灵活,因而更偏好军方实权派人物上台主政。这就意味着,建立在多头格局之上的沙鄂—江萨政权比以往更依赖国王的支持,无法再现先前军人与国王的政治共生关系。如果说1976年10月政变后NARC接受极右翼保皇分子他宁组阁是遵循了国王的旨意,那么1977年10月政变推翻他宁内阁在国王看来无异于“反动”之举。NARC指责他宁内阁“独断专行”无助于社会安定,但他宁下台后不久即被任命为枢密院大臣,得到了王室的褒奖。两相比较,足见普密蓬国王对NARC二次政变和江萨直接掌权的不满。当江萨无力应对外部安全挑战和内部经济波动时,本就不受国王青睐的他很快被人取代。江萨辞任总理前夕与炳一同到清迈觐见国王,并在返回曼谷后立即宣布辞职;国王的提前介入虽说使江萨避免了被公开政变推翻,但还是以隐蔽的政变方式让其下台了(Chai - Anan, 1982:36~37; Handley, 2006:278)。

概言之,建立在文武多头格局之上的沙鄂—江萨政权没有实现对权力资源的垄断,短暂的执政伴随着军人派系高度分化、文官集团在议会的阻挠等严峻挑战,最后只能被新兴的军人领袖取而代之。此外,由于缺少国王的强有力支持,沙鄂—江萨政权经历了三次政变(1977年3月、1977年10月和1980年2月),致使包括合法性在内的诸多权力资源不断流失。如此,该军人政权只能具有低度韧性。

(四) 小结与讨论

1947~1992年间,泰国先后出现了五次军人政权,它们在持续时长和稳定性两个方面各具差异,上文解释了三个主要案例的差异。限于篇幅,有关两个辅助案例(炳政权、顺通—素金达政权)的分析只能放到工作论文之中。本文的案例比较表明,权力格局的作用是首要的,它几乎决定了军人政权能否长期持续;在此基础上,国王的支持力度会显著影响军人政权稳定性的高低。

具体而言,能够长期持续的三个军人政权都是建立在军事寡头之上,尽管三者稍有不同:披汶政权主要得益于陆军三大派系共同对权力资源的支配;沙立—他依政权建立在几乎唯一的派系对权力资源的垄断之上;炳政权则是凭借良好的个人声誉和灵巧的政治手腕,在与文人政党势力的动态博弈中确保了军人的支配地位。不过,即便是能够长期执政,一个军人政权要想同时保持高稳定性,还必须获得国王的强力支持。与长期执政者相对,两个短期持续的军人政权都是建立在文武多头之上,缺少国王的支持使得沙鄂—江萨政权只具有低稳定性,但得到国王的支持也没能使顺通—素金达政权免于民众抗争的压力,最终只能仓促又黯然地还政于民。总之,泰国军人政权的高度韧性源于军事寡头对权力资源的支配和国王提供的有力支持,两者缺一不可。

如前所述,本文的比较分析是一项新的研究尝试,因为既有文献尚未有过专门探究。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存在某些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因素或变量,具体可以概括为干政程度论、安全环境论、美国态度论及经济绩效论等四种解释。在工作论文中,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上述观点与本文解释的关系。概言之,干政程度论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问题而不具有任何解释力,安全环境论提供了一定的互补性解释但也只能涵盖部分案例,美国态度论由于理论预期的矛盾也不构成竞争性解释,经济绩效论则因摆脱不了内生性问题而缺乏说服力。

五、结 语

文章对泰国的研究表明,军人政权的韧性主要受制于文武精英之间的权力格局和国王的支持程度。尽管泰国军事精英的政治影响力在绝对意义上胜过文官精英,但这不必然保证军人能够连续执掌政权,所以我们看到1932年“立宪革命”以来泰国时而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时而由文官主政。在军文政权交替出现的泰国,本文捕捉到了军人政权生存状况的多样性,并从纵向的历史比较视角出发探讨了其中的原

因。通过变换参照对象和分析层次,本文希望引导人们摆脱关于军人政权“天生短命”、“天生不稳定”的刻板印象,以更加审慎且开放的心态去探索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当然,本文的单一国家研究尚不能提供宏大或普遍的理论贡献,但作为一项先导性研究(pilot study)无疑可以激发学术对话和理论创新。本文的研究表明,对于军人政权及其与不同政体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在追求精细、完善的理论化之路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参考文献:

- 陈明明,2003:《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2018:“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3:145—155。
- 周方治,2011:《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罗伯特·达尔,2003:《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Agüero, F., and Brückner, J., 2018.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litary Rule: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in J. Gerschewski and C. H. Stefes, eds. *Crisis in Autocratic Regim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 Baker, C., and Pasuk P., 2009. *A History of Thailand*. 2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anchard, W., ed., 1958. *Thailand: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New Have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Press.
- Brownlee, J., 2007.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i – Anan S., 1982. *The Thai Young Turk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Chai – Anan S., and Suchit B., 1985. “Thailand.” in Zakaria H. A. and H. Crouch, eds. *Military – Civilian Relations in South – 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mbers, P., 2013. “A Short History of Military Influence in Thailand.” in P. Chambers, ed. *Knights of the Realm: Thailand's Military and Police, Then and Now*.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 Choucrair – Vizoso, J., 2016. *Organizing Power: Elite Networks and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Danopoulos, C. P., ed., 1988. *The Decline of Military Regimes: The Civilian Influ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Darling, F. C., 1965.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 Fineman, D., 1997.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 – 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Geddes, B., Frantz, E., and Wright, J. G., 2014. “Military Rul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147 – 162.
- Gerschewski, J., 2013. “The Three Pillars of Stability: Legitimation, Repression, and Co – optation in Autocratic Regimes.” *Democratization*. 20(1): 13 – 38.
- Girling, J. L. S., 1981. *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ndley, P. M., 2006.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bol Adulyadej*.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N., 1971. *Modernization without Development: Thailand as an Asian Case Stud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Kamol S., 1969. *The Thai Military in Politics: An Analytical Study*. Ph. 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Levitsky S., and Way, L. A.,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2. “Beyond Patronage: Violent Struggle, Ruling Party Cohesion, and Authoritarian Durabil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0(4): 869 – 889.
- Likhit D., 1992. *Demi Democracy: The Evolution of the Thai Political System*.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Mahoney, J., and Goertz, G., 2004.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4): 653 – 669.
- Morell, D., and Chai – Anan S., 1981.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Reform, Reactio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 Muscat, R. J., 1994. *The Fifth Tiger: A Study of Thai Development Policy*. Armonk: M. E. Sharpe.

- Nordlinger, E. A. , 1977.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 Hall.
- Nuecheterlein, D. E. , 1965. *Thailand and the Struggle for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asuk P. , and Baker, C. , 2002. *Thailand: Economy and Politics*. 2nd Edi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lmutter, A. , 1977.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later, D. , 2010.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ater, D. , and Fenner, S. , 2011. “State Power and Staying Power: Infrastructural Mechanisms and Authoritarian Durab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1): 15 – 29.
- Surachart B. , 1999. *From Dominance to Power Shar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1973 – 1992*.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 Suwannathat – Pian, K. , 1995. *Thailand's Durable Premier: Phibun through Three Decades, 1932 – 195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ak C. , 2007.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sm*.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 Wilson, D. A. , 1962. *Politics in Thai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yatt, D. K. , 2003.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2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nfiguration of Power, Support from the King, and the Resilience of Military Regimes in Thailand

Cao Hang & Tang Ship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Researchers have accumulated a great deal of knowledge about the regime resilience (duration and st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the differentiated resilience of military regimes has not been taken seriously. In this article, we explain why there are substantial variations in resilience among different military regimes. By comparing five military regimes in Thailand from 1947 to 1992,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only the military regime based on military oligarchy and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King can enjoy a high degree of resilience (long duration and high stability); a military regime based on military oligarchy but lacking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King has only a moderate level of resilience (long duration but low stability); the military regime established on civil – military polyarchy,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gains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King or not, is difficult to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so it can only show a low level of resilience. This article will help scholars carry out specific and meticulous studies on the military regi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Military Regime; Regime Resilience; Military Oligarchy; Civil – Military Polyarchy; King

(责任编辑: 闫 健)